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

李喜所 主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

李喜所 主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 / 李喜所主编. —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1

ISBN 7-80696-162-3

I. 梁… II. 李… III. 梁启超 (1873~1929) —
思想评论—学术会议—文集 IV. B25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0548 号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

主编 / 李喜所

出版人 / 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三河市富华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26.75 字数 650000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0696-162-3

定价: 48.00 元

本书编委会

编委（按姓氏笔画）：

元 青 付学军 刘文君 张林元
李梦芝 吴裕成 李喜所 郑全喜
侯 杰 赵金铭 姜维群 董令生

常务编委：

李梦芝 侯 杰

主任：李喜所

副主任：张林元 姜维群

前 言

梁启超的一生明显分为政治和学术两个层面。从25岁与康有为发动戊戌变法开始,梁启超就希望通过和平改良的办法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政治。被迫流亡海外的14年,他一方面完善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一方面开展各种政治活动,并渐渐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影响甚广。1912年返回朝思暮想的祖国后,自以为迎来了建立议会民主政治的良机,很快卷入了组党结社、参政议政、竞选做官的政治旋涡中去,结果是所梦想的民主政治件件落空,军阀混战的闹剧不断上演。失望的梁启超不得不在1918年底宣布“中止政治生涯”。不过,历史地看,梁启超的政治搏击虽然失败了,但为中国的民主政治留下了厚重的思想理论和值得借鉴的宝贵的经验教训,梁启超本人也借着起伏不定的政治风云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令人钦佩的是,梁启超在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从来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他总是结合政治的变动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反思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推进中国古典文化的现代转型,其在政治学、历史学、文学、哲学、社会学、新闻学、教育学、经济、法学、宗教、美学等许多领域都颇有建树,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尤其是1919年后的10年,梁启超在执教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的同时,常往全国各地讲学,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学术研究当中,写出了《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经典名著。与此同时,他极力宣扬通过融合

中西文化，创造超越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第三种文明”，成为以现代新儒家为核心的“东方文化派”的主要奠基人。总之，梁启超既有政治魅力，又具学术魅力，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广阔的历史空间。

梁启超从1873年出生到1929年去世，仅度过了56个春秋。粗粗算来，他在广东老家新会住13年，以广州为主要居处8年，来往于北京、长沙、上海等地6年，流亡日本等地14年，以天津为家15年。在天津居住时间最长，房子也最好、最大。坐落在天津河北区的梁启超饮冰室故居，是两座漂亮的欧式小洋楼，一度住有九十多户居民。为整合梁启超的文化资源，保护文物古迹，提升天津的文化品位，天津市政府于2001年斥巨资修复了饮冰室，建立了梁启超纪念馆。为推进梁启超的研究，2002年又成立了梁启超研究会，推举张林元为名誉会长，我和姜维群为会长、副会长。研究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2003年梁启超诞辰130周年的时候，举办梁启超国际学术研讨会。经过一年多艰苦的努力和紧张的筹备，由南开大学、河北区政协、今晚报社、天津古籍出版社和梁启超研究会联合举办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3年10月12日至16日在天津远洋宾馆顺利召开了。这是关于梁启超研究的首次国际学术会议，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共有一百五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内地学者一百多人，港台地区以及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韩国学者三十多人，梁启超的后代二十多人。会议收到论文138篇，涉及梁启超的生平、交友、政治活动、价值取向、社会关系、对外交往、家庭生活、晚年走向、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文化思想、教育思想、新闻思想以及史学、文学、伦理、佛学、女性解放等，有关梁启超的学术文化的论文更多，也更具深度。总之，这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将梁启超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会议结束后，立即组成了专家评阅小组，选出五十多篇论文，

编成这本论文集,交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李梦芝编审承担了繁重的编务事宜,并仔细审阅了全部书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林绪武同志任劳任怨,做了许多非常琐碎而繁杂的具体工作;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

李喜所

2004年4月6日

目 录

前 言	(1)
从改造到动员:梁启超在政治运动中对 国民态度的转变	张玉法(1)
论梁启超对清末时局的审视 ——以《国风报》之时论为中心	王 杰 李振武(19)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与当代“过渡期历史观”的 构造	杨念群(33)
梁启超的“过渡时代”政治观	刘 伟(42)
略论梁启超的国家结构观及其活动	严昌洪 张继才(56)
欧战后梁启超对中国宪政道路的反思与 探索	刘保刚(68)
略论梁启超的政治法律制度思想	谢俊美(83)
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	(美)汪荣祖(96)
梁启超与传统墨学	马克锋(121)
梁启超与佛学研究评析	秦 方(133)
梁启超与儒家传统:以清末王学为中心之 考察	黄克武(141)
梁启超的中庸哲学	方志钦(154)

从痴迷到迷惘

- 梁启超与近代新学的历史命运……………王先明(170)

剖析梁启超晚年的思想走向

- 以《欧游心影录》为中心……………李喜所(201)

梁启超 1919 年的旅居法国与晚年社会文化

- 思想上对欧洲的贬低……………(法)巴斯蒂(218)

五四以后梁启超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

- 以重新解读《欧游心影录》为中心……………耿云志(238)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元青(251)

A Chinese contribution to a new political and

cultural world order after World War I

- The Case of “Impressions of a Voyage to

Europe” by LIANG Qichao

- ……………(德)Gilbert Metzger(275)

伯伦知理与梁启超：思想脉络的考察……………潘光哲(295)

理解的可能：《卢梭学案》与《社会契约论》之

- 比较……………颜德如(302)

“化合”中西的价值取向及其成因

- 晚年梁启超中西文化观论析……………刘集林(335)

“东方主义”与自我认同

- 梁启超中西文化观的再阐释……………李里峰(352)

梁启超中西合璧学术思想的形成历程

- ……………李春雷 王珊(370)

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述论……………徐松荣(380)

梁启超伦理思想述论……………徐曼(404)

论梁启超的普世伦理思想.....	陈 敬(416)
梁启超的社会保障思想刍议.....	杨齐福(428)
Terrorists of Heroes?	

——LIANG Qichao and Early

Chinese Perceptions of Anarchism(Prior to 1903)

.....	(德)G·Müller(441)
-------	------------------

论梁启超的社会转型与教育改造思想.....	林家有(459)
梁启超与清华.....	刘晓琴(478)
论梁启超与南开大学文科的初期发展.....	彭小舟(500)
试论梁启超的科学观.....	范铁权(512)
康有为梁启超晚年科学观的比较.....	贾晓慧(524)

梁启超——中国近代妇女解放史上不可略过的

名字.....	黄嫣梨(539)
梁启超“新妇观”的文化平议.....	汪丹 汪兵(554)
梁启超、《时务报》与中国近代女性的解放	
.....	林绪武 董蓓(568)
天足会与不缠足会.....	(日)高岛航(581)

梁(启超)、张(之洞)交谊交恶述论 黎仁凯(601)

梁启超笔下的谭嗣同

——关于《仁学》的刊行与梁撰《谭嗣同传》

.....	(日)狭间直树(618)
-------	--------------

梁启超追悼谭嗣同的活动与晚清烈士观念的

形成.....	(日)吉泽诚一郎(633)
梁启超与人物传记研究的现代走向.....	李梦芝(648)

梁启超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	王晓秋(660)
戊戌维新前后的张之洞、康梁与日本	
.....	(日)孔祥吉(671)
试论梁启超的日本观与其思想转变的相互	
关系.....	(日)班 玮(702)
戊戌维新前后梁启超与东亚同文会的关系	
述论.....	周德喜(734)
近代中国报界之巨子梁启超.....	周兴樑(747)
民族“想象”的魔力:论“小说界革命”与“群治”之	
关系.....	陈建华(777)
对梁启超“释革”一文的一点浅见.....	(德)乔 伟(799)
简析《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对梁启超的评价.....	张永芳(801)
《梁启超全集》前言(节选)	汤志钧(822)
深化与拓展梁启超研究	
——从《梁启超全集》的编纂谈起	张 磊(827)
百年来梁启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侯杰 李钊(834)

从改造到动员：梁启超在政治运动中对国民态度的转变

张玉法

一、前言

梁启超的一生丰富多彩。他是学者、文化工作者、政府咨议人员、政府官员和政治运动家。他的政治运动，主要借助于报刊发表言论，所以他也是新闻工作者或政论家。本文是从政治运动家和政论家的角度来看梁启超对国民态度的转变。

梁启超一生所参与的政治运动，主要有四：即维新运动、立宪运动、反洪宪帝制运动和五四运动；所倡导的运动主要有二，即国民制宪运动和裁兵废兵运动。在此六个运动中，由于各个运动的性质并不相同，梁启超对国民的态度和期望也不一致。大体而言，先后有改造国民（包括批判国民）和动员国民两种态度，而态度的转变则与政治的背景和运动的性质有关。

二、改造国民是改造国家的基础

戊戌变法时期，来自民间的变法派注意到国民的力量，认为改造国民是改造国家的基础，并为文加以宣传。提出这个议题的第一人应推严复，而梁启超对这个议题持续发挥。

（一）议题由严复提出

严复是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871年19岁时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1879年毕业于英国海军大学，1890年督办北洋水师学堂。受甲午战争的刺激，于1895年开始翻译赫胥利（T. 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鼓励国民自强，到1898年该书

定稿出版。其间，严复于1895年二、三月间于天津《直报》陆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等文，警醒国人，并提出富国强兵之法¹。

《论世变之亟》一文警告国人日祸不过为开始，俄、法、英、德将继续为祸中国，国人若不知危亡，“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该文除警醒国人以外，指出西洋优于中国之处在崇自由、尚平等、尊新知、重人才、抑主隆民、屈私从公，并大胆提出了效习西洋的主张：“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²

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论及西洋和中国强弱异势，颇偏重“人”、“民”或“人民”的因素。在《原强》一文中，更把“民”视为国家强弱的根本。他说：“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至于民智之何以开、民力之何以厚、民德之何以明，三者皆今日至切之务，固将有待而后言。”³

当严复于天津《直报》陆续发表鼓吹改革的文章之际，梁启超于1896年8月开始在上海任《时务报》主笔。梁启超希望物色好的稿件，在《时务报》发表，马建忠所撰《马氏文通》和严复所译的《天演论》，稿子都送到了梁启超手里⁴。1896—1897年间，梁启超与严复颇有书信往还，有些是讨论稿件发表的事。1896年10月严复致梁启超的信中有云：

甲午春半，正当东事集兀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登布《直报》，才窘气恭，不副本心，而《原强》诸篇，尤属不为完作。盖当日无似，不揣浅狭，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亦靡效。……是以今

日之政，于除旧，宜去其害民之智、德、力者，于布新，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仆之命意如此，故篇名《原强》也。……拙译《天演论》，仅将原稿寄去。登报诸稿，排奇数篇，金玉当前，自惭形秽，非敢靳也。《原强》如前所陈，拟更删益成篇，容十许日后续呈法鉴何如。⁵

此函应是梁启超向严复索《天演论》、《原强》等稿，严复仅将《天演论》稿寄去，而答应将《原强》修改以后再寄。

其后，严复将已发表的《原强》一文大量增删，对民力、民智、民德的论述，较前详细而有系统。文中说：

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自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对于如何鼓民力，严复希望国民能够气体强健，不忘武事，骁猛坚毅，耐苦善战，入手之方则为禁止吸食鸦片和禁止女子缠足。对于如何开民智，严复提出变通学校、设学堂、讲西学，并废八股、试帖、策论，另开用人取士之法。对于如何新民德，严复提出只要讲求平等、自由，有民选议院、民选官吏，则民自有“各私中国”之心⁶。

此稿未见《时务报》发表，可能的原因，严复并未将此稿及时写给梁启超。但严复的改造国民思想，从梁启超日后的文章和行事看来，对梁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二）《时务报》时期梁启超对此议题的宣扬

梁启超于1896年8月任上海《时务报》主笔，1897年11月转往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主持《时务报》的一年多中，如前所述，与严复常有书信往还。除前引在1896年10月前后严复致梁启超的信外，1897年3月间有一通梁启超回严复的信。从信的内容看，是严复对梁启超在《时务报》所发表的文章有所批评，梁启超一

一提出解释。梁在信中特别对民权和民主加以肯定,并对严尊礼备至,谓“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按严复比梁启超大16岁)⁷。

梁启超在《时务报》所发表的文章,以《变法通议》为代表,全文共分13小节,自创刊号登起,一直到第43期为止。文中对于“民”的基本论点,与严复的看法大体是相同或相似的。《变法通议》文中有谓:“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变科举的办法,梁启超主张或于科举考试课目中增加有关中外史学和声光化电方面的内容,或在传统考试科目之外,增开一些新的实用科目,如兵法科、技艺科、明医科等。《变法通议》文中又有谓:“以开民智为第一义”⁸。由于梁启超认为中国民智未开,当时他主张应先办学校,把开议院放在后面。在《古议院考》一文中说:“问今欲强中国,宜莫亟于复议院,曰未也。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开议院,取乱之道也。故强国以议院为本,议院以学校为本”⁹。此外,梁启超对“群”的看法,据梁启超本人说,也曾受严复的影响。梁说:他当时作《说群》一书,即是在读了严复的《天演论》和谭嗣同的《仁学》之后,“黎然有当于心”,“乃内演师说,外依两书,发以浅言,证以实事,作《说群》十篇、一百二十章”¹⁰。《天演论》十六论述“群治”道理,谓“善保群者常利于存,不善保群者常邻于减,此真无可如何之势也”¹¹。这应是梁启超重视群体的本源。

梁启超在离开《时务报》、主持长沙时务学堂以后,继续鼓吹兴民权、广民智。他在上湖南巡抚陈宝箴论湖南应办之事书中说:“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又说:“今日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梁启超在上陈宝箴书中,不仅申述广民智、兴民权的重要,而且认为开民智必先开绅智、开官智,建议陈宝箴仿西方议院之制,令乡绅有议事之权。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是开民智的一个管

道；倡组南学会，则为开绅智、开官智的人手之方¹²。另一方面，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讲义和学生札记的批答中，也表达兴民权、行议院制的观念，并对君、臣、民三者的关系提出新的见解，他说：君和臣都是为民办事的人，君主好比铺子的总管，臣相好比铺子的掌柜，人民则是股东；如果君臣办理不善，人民完全有权予以解职。梁启超并宣言：“公法欲取人之国，亦必其民心大顺，然后其国可为我有也，故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¹³

在戊戌时期，梁启超不仅承严复的余绪，宣扬改造国民，而且也有动员群众的经验。惟当时动员的对象不是全国国民，而是士绅阶层。他在这方面的经验，较早的一次是1895年5月，当时康、梁师徒动员到六百余名在北京参加乡试的举人上书清廷，反对与日本议和，建议迁都再战、推行变法。其后他于1897年在湖南办南学会，动员湖南士绅参加；1897—1898年间在北京协助其师康有为办保国会，动员入京赶考的举人参加。而1897—1898年间梁启超在北京，另外曾三次动员在北京的举人联合上书。第一次在1897年3月，联合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山西、陕西、江苏、浙江等省举人百数十人上书都察院，反对俄国租借旅大。第二次在1898年5月，经过梁启超等人的联络，共有八省举人先后上书八次，总人数多达1,500人，要求抗议德兵毁坏山东即墨文庙内的孔子塑像。第三次亦在1898年5月，梁启超联合各省举人百余人，上书请变通科举，请皇帝特下明诏，将下科乡试及生童岁科试停止，同时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痛斥八股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脱离实际¹⁴。而“变通科举”也是前此严复和梁启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所鼓吹的一个改革议题。

（三）《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期梁启超对此议题的宣扬

戊戌时期，严复和梁启超都认为要先改造中国必先改造国民，并先给国民一些权利，如自由权、平等权之类。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于1898年12月23日在横滨创办《清议报》。1901年12

月21日《清议报》停刊，梁启超又于1902年2月8日创办《新民丛报》。梁启超于《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改革性的或革命性的言论，此期间，严复留在京津为官，从事译介西方的社会科学经典，并为文宣扬新思想。梁启超不断把他所主编的《新民丛报》寄给严复，并曾在《新民丛报》中推介严复所译的《原富》。严复于1902年4月有函致梁启超，不谈政治，只谈学术，特别标榜“著译之业”是“播文明思想于国民”，而自己屹屹于著译，亦在“了国民之天责”¹⁵。值得注意的是在戊戌时期，严复、梁启超均少用“国民”一词，《清议报》创刊以后，“国民”一词的使用始渐普遍，在《新民丛报》时期，梁启超更曾以“中国国民无共和国民之资格”为职，与革命派论战。

梁启超在《清议报》所发表的文章中，与改造国民有关的议题，并未超出戊戌时期。梁启超将国家的强弱系于国民，他于1899年在《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一文中说：“凡一国之存亡，必由其国民之自存自亡，而非他国之能亡之也。苟其国民无自存之性质，虽无一毫之他力以亡之，犹将亡也；苟其国民有自存之性质，虽有万钧之他力以亡之，犹将存也。”该文认为，“中国人于来世纪，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但不能“委心任运”，“必加以人力”，“所谓人力者何？一曰合大群，二曰开人智”¹⁶。

其后，梁启超于《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1899）一文中正式对“国民”一词有所界定：“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该文论述的重点是国民与国家之异、国民竞争与国家竞争之异、今日世界竞争与国民竞争，其目的在以“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理，将世界各国的竞争定义为“国民之争自存”，期望中国国民能发挥“国民力”，与世界各国竞争¹⁷。其基本上是冀望国民的改造，以改造国家。

为了改造国民，梁启超于《新民丛报》创刊之始，即发表长篇连